

张百熙启始拓基

(校史研究室 魏书亮)



1902年1月，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，主持教育改革新政，经理京师大学堂。1904年1月，清廷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。不久，又专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。随着孙家鼐、张亨嘉的到任，张百熙结束了主持大学堂的事务。在这两年时间里，师范馆、仕学馆、译学馆、医学实业馆相继成立并招生运转，重建的京师大学堂条规详备、格局初具、教习到位、分类课程确立，并按计划派出了留学生，建立了正常运行的稳固根基。

张百熙因开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，被北师大人尊为首任校长。

张百熙是清廷重臣，历任工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邮传部尚书等要职，在清末新政中颇多建树。张百熙同时也是一位学问宏通、关注新学、勇于革新的清末教育家，曾先后在山东、四川、江西、广东等地担任乡试考官、学政，并担任过国子监祭酒，是少有的熟悉大清教育现状和学政弊病，能够切中肯綮、开物成务的稳健派改革干将。

受理复建大学堂之初，张百熙向清廷上疏（《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》），称“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，非徒整顿所能见功，实赖开拓以为要务，断非因仍旧制，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”，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学思想。在清末新政中，任何一项措施的展开，都会遇到“守旧派”和“革新派”的对立，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个复杂而集中的“两派”观点纷争的交汇点，采取“基旧开新”的策略，可以说是一种着眼于实际的明智和上策。大学堂恢复之初，考虑到“并无应

入学肄业之学生”，各省开办中小学堂尚需时日，遂决定暂不设本科，先办速成二科和预备科。

1902年12月17日，恢复的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，实际上只有师范馆和仕学馆，200余名学生中，师范馆的超过三分之二。1903年大学堂不足300名的在堂学生中，师范馆达195人。为什么“师范馆”受到格外的重视？我们可以根据清廷谕旨、大臣奏疏、学堂章程进行适当的推理。

由于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和争斗，回应社情民意、国际观瞻的清末新政多议而未举，兴学育才因关涉面广，且有形迹仍留的京师大学堂为抓手，于是成为急务，“应即切实举办”。新式学堂的开设，需要大量的学员，师范是“群学之基”，“欲求学员，最重师范”，“办理学堂首重师范”当然也同样成立。师范馆的招生，“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”，在京招考由管学大臣主持录取，余下名额由各省选送，要求“品行端正，志趣宏远，中学既具功底，西学已谙门径”。毕业生在晋身上要高一级，“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，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，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”。派出留学的比例，师范馆的也高，京师大学堂首批派出的47名留学生中，31人是师范生。以张百熙主持制定的《钦定学堂章程》为基础，并由张百熙、张之洞、荣庆共同主持修订而成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是由政府颁布、首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系统，俗称癸卯学制。在这一学制中，《优级师范学堂》单独制定，从中也体现了张百熙对师范馆的长远规划，这是此后北京师范大学独立建制的法令和制度依据。

在教员的选用上，张百熙更是费尽心机，倾力以求。在他看来，“大学堂之设，所以造就人才，而人才之出，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”，为敦请“学问纯粹，时事洞明，淹贯古今，详悉中外”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出任总教习，他身着大礼服跪地以求，且语句动情，“吾为全国求人师，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。先生不出，如中国何！”在他的力请下，张鹤龄、蒋式理、杨道霖、王舟瑶、屠寄、杨模、胡玉麟、陈黼宸、林纾等名家大贤、时才俊彦，一时云集京师。服部宇之吉、太田达人、氏家谦曹、坂本健一、矢部吉被、西村熊二、铃木信太郎、高桥勇、桑野久任、法贵庆次郎等各科洋教习也日益齐备。对于这些教习，他通过委以重任、派遣出国考察、提供优厚薪金等方式，使他们安心教学、敢于任事，“这学堂要办得好，就衮衮诸公；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，就诸公滚滚。”表面上

似是对教员们的戏谑，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对教员们的高度信任和期许。

张百熙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师范馆课程的创设。他将京师大学堂分为两科：“一曰政科，二曰艺科。以经史、政治、法律、通商、理财等事隶政科，以声、光、电、化、农、工、医、算等事隶艺科”。师范馆则有“伦理学、经学、教育学、习字、作文、算学、中外史学、中外舆地学、博物学、化学、外国文学、图画、体操等十四门功课”。师范馆的课程设置不仅中西并重，且普通与专门衔接，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齐备，这为以后高等师范教育课程的改进和分化提供了根据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方向。

张百熙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此。在他主校期间，大学堂的日常运行经费有了着落，马神庙原址严重损毁的校舍得到了扩建，大量的仪器设备得以购置，随着藏书楼、译书局、编书处的设立，教材和资料变得应付裕如。在他的推动和努力下，一个有着现代大学特质的京师大学堂重建起来了。有人称他为中国“大学之父”、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，对于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来说，他的创始、开拓之功，永为我们所纪念。